

杨国夫遗著

斗在

徐

山东人民出版社

战斗在清河平原

杨国夫遗著

战斗在清河平原

杨国夫 遗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七二一三工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5.5印张 6插页 110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1—40,100

书号11099·299 定价1.25元

代 序

我怀着深切的怀念之情，看完了杨国夫同志的遗作——《战斗在清河平原》，仿佛又看到了国夫同志和广大军民一起，英勇奋战在硝烟滚滚的清河、渤海战场上。

国夫是位身经百战的老同志，他早年参加革命，长征之前，曾在红三十军任团长。一九三八年五月，国夫同志奉命赴鲁北清河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任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司令员、渤海军区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迅速从各解放区抽调干部和部队奔赴东北战场，那时，我和国夫同志一起被调到了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工作。在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里，我们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团结战斗，直到部队南下江西后才分手。一九八二年二月四日，惊悉国夫同志因患肺癌，在北京逝世。闻此噩耗，我心中非常悲痛。他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我们人民军队失去了一位忠诚的老战士。

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下，国夫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干部。他在清河、渤海平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政策、指示，并从清河区的具体实际出发，努力探索平原地区抗日游击战的经验，成功地总结并运用了奇袭、伏击、爆破、坑道作业等游击战术。在清河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全部“蚕食”的险恶形势下，国夫同志多有独到见解，指

挥若定，统筹全局，带领广大军民坚持反“蚕食”斗争，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为创建、巩固和发展清河地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夫同志英勇善战，热爱人民和军队，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他十分注意对部队的整顿和训练，强调部队作战要勇敢，作风要紧张，士气要高昂。工作中，他勇挑重担，不避艰险，从不争功诿过，对原则问题毫不退让。他不仅能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也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他作风朴实，和乡亲拉起家常，如同家人，和战士谈起心，亲如兄弟。直到他当了司令员，还是乐意乡亲们称他“老杨”，在他身上，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得到了具体体现。

《战斗在清河平原》，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杨国夫同志在清河平原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坚持抗战的斗争活动，热情歌颂了清河、渤海地区党和广大军民的抗战业绩。出版国夫同志的这本遗作，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洪学智

引 言

小清河西起济南，东注渤海。清河平原东连胶东，西枕津浦，南沿胶济铁路，北临冀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辽阔的清河平原，既是威胁敌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济南的前沿阵地，又是山东各战略地区交通联络的枢纽。清河平原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狠狠打击了敌人，配合全国、全省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八年，我和英勇的清河平原军民生死与共、并肩战斗了七个寒暑。三十多年过去了，那些可敬可亲的父老乡亲们的面影，那些军民一体浴血奋战的战斗场面，经常浮现在眼前，永远难忘。

作为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一名老战士，眼下我已到了暮年，总觉得有义务、有责任把清河军民团结战斗的业绩写出来，奉献给英雄的清河人民，答谢他们当年对子弟兵的养育之情；悼念在硝烟烽火年代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无数先烈；并以此启发后人，发扬革命传统，振奋爱国主义精神。

还需要说明一点：在动手写这篇回忆录时，我给自己规定了这么一条原则：忠于历史、忠于事实。但是，因为我的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加上年老多病，一些草稿都是匆匆写成，文笔和结构就顾不上斟酌推敲了。我想，见到这篇回忆录的同志，是会理解这种情况的。

目 录

代序	洪学智
引言	1
奉命到敌人后方去	1
整编第三支队	10
坚持清河平原斗争	28
难忘的会见	51
创建平原根据地	59
粉碎敌人“扫荡”的艰苦岁月	91
胜利反“蚕食”，渡过难关	115
横扫“蚕食”据点，准备反攻	126
局部反攻	136
全面反攻	157
结束语	162
后 记	165
附：	
杨国夫同志简历	
清河、渤海地区示意图	

奉命到敌人后方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影响下，华北大片国土很快沦陷，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险关头。

这时，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和影响下，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在全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为实现全面抗战，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同时，抽调了大批干部，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然后派往敌后，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天，我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到抗大学习。当时，我在陕北红四师十二团任团长，很快交待完工作，打起背包奔赴延安。十二月的陕北，冰天雪地，寒风凛冽，但我走在延河畔，却感到天地间充满生机。仰望宝塔山，不由我思绪万千……延安，这里是全国抗日战争的司令部，党中央和毛主席战斗、工作的地方；我们党，她正肩负着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责任，在她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希望；我还想到自己那苦难的童年——我出生在安徽省霍邱县洪家集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早亡，七岁就给地主放牛、在油坊帮工，从小上不起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一九二九年秋，红军打到洪家集，把我从悲惨的生活中解救出来，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参加红军以后，在党的教育

下，懂得了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逐步成长起来。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北地区的懋功会合以后，我们团被抽调出来编入了红一方面军。从此我们摆脱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束缚，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胜利到达陕北。

为了适应抗战的新形势，直罗镇战役之后，组织上曾安排我到“红大”第一期学习。虽然不待结业即被提前调出参加作战，但这次学习却使我大开眼界。现在又有机会到“抗大”学习，又可以当面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学习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我的心情怎能不激动！

在抗大的日子里，同学们天天都在想着抗战的前线，盼着早日上战场去打击日本侵略者，但又知道学习机会难得，只有弄明白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才能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新任务。因此，大家对学习都非常认真。在抗大期间，毛主席多次来给我们讲课。在我们即将奔赴敌后的前夕，毛主席、刘少奇、任弼时同志还来集训驻地亲切接见了我们。毛主席精辟地分析了全国抗战的基本形势，谆谆教导我们说：你们到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条件十分艰苦，情况比较复杂。因此，一定要牢记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要象种子扎根在泥土里一样，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才能发芽、开花、结果。要搞好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毛主席还专门讲了在山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他说：在山东，要开辟以下几个抗日根据地，一是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逐步向苏鲁边区发展；二是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鲁中根据

地；三是以淄川、博山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逐渐向北发展；四是胶东根据地……最后，毛主席以对我们完全信任的语调，伴随他那把千军万马引向胜利的强有力的手势，强调说：“只要我们坚持抗日这个方向，坚持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持久战，抗战就一定胜利。”毛主席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刘少奇同志对毛主席的指示作了补充。他说：毛主席讲的在山东建立几个抗日根据地，鲁中的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是中心。鲁北、清河，以及鲁南的平原地区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建立起长期的巩固的根据地，还要实践来检验。要利用青纱帐把部队分散开行动，必要时回山区休整。要建立地方党，发展地方武装。会场上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听了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的讲话，心里象燃起了一团火，更觉得肩上的担子重大和光荣。我默默地下定决心：一定不辜负党的教导，到敌后去，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切。不久，我们这一支五十多人的干部队伍，在郭洪涛同志的带领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向敌后的山东进发。

从延安到山东，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当我们途经国民党统治区西安的时候，首先遇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阻挠、刁难，强逼我们把枪支和马匹留下。同行的高克亭、马千里两位同志为此奔波于西安和延安之间，与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打通各种关系，联系党的组织，很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才闯过这一关。在征途中，我们还目睹了国民党统治区毫无抗战气氛，酒楼饭馆里军官们醉生梦死，高谈着日军西来、准备逃跑；大官们早已把家中物资装上军用汽车，随时准备开动。这使我们进一步感到，领导抗日救亡的伟大历史重任，只有我们党才能承担。想到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人民的殷切期望，看着

眼前的情景，恨不得一步迈到山东抗日前线。

经过长途跋涉，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六日，我们终于到达了山东省泰安市东南的南尚庄。这时大家才知道郭洪涛同志是新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五月二十一日，省委在这里召开了重要会议。郭洪涛同志主持会议并代表省委作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报告。不久，毛主席、刘少奇针对山东的实际情况，指示山东省委：山东的基干武装应组建成支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的番号，以抵制国民党投降派的控制。我们被分别派往山东各地负责各支队的组建工作。我和霍士廉、鲍辉同志先后被派往鲁北的清河平原，任务是：将党领导的两支抗日队伍——马耀南同志指挥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和李人凤同志指挥的“三大队”（原“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整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以淄川、博山山区为依托，发动群众，开展平原游击战，建立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

南尚庄会议后，遵照省委的指示，我就从博山的佛村，赶赴清河地区。跨过胶济铁路，鲁北大平原便展现在我的面前：稀稀落落的秋庄稼点缀着大片荒芜的田野，疲惫不堪的逃难群众，拖儿带女漫无目的地在田间小道上奔波；所过村庄，但见破门漏屋、残墙废井；不远的胶济铁路上，时时传来日军警车耀武扬威的鬼叫般的轰鸣……真是山河破碎，满目荒凉！不过，所过之处，仍可以从这里那里的高墙上看到“国共合作，抗日到底”的标语，十分醒目。我心里默念着：“抗日到底！抗日到底！”有中国共产党，有人民的军队，有全国人民的全面抗战，中国亡不了，中华民族亡不了！

踏上清河平原的土地，我更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沉重

的，一路上都在考虑：应当尽快地建立起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抗大的日子里，毛主席曾多次强调建立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一九三八年五月，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当时，在山区和江河港汉地区建立根据地，全国已有实践，而在这辽阔的平原开展游击战，建立巩固的长期的根据地，却还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而且，眼前在等待我去整编的这两支队伍是什么状况呢？我马上就要见到的这两个在清河平原拉起抗日队伍的传奇式人物是什么样呢？据省委介绍，在这里拉队伍的马耀南、李人凤同志，都是知识分子，又都是当地社会名流，他们欢迎我这个从小放牛、没进过一天书房门的“土八路”吗？在以后共同战斗的日子里，我能跟他们搞好团结吗？我自己应该怎样主动努力去搞好这个团结呢？如何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把社会各阶层抗战的人们统统团结起来，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夺取抗战胜利呢？……困难虽然很多，但路是人走出来的，党交给的任务一定要完成！我怀着这样的心情，见到了中央清河特委的各位负责同志。熟悉当地情况的金明同志等向我介绍了马耀南和“五军”以及李人凤和“三大队”的一些具体情况：

马耀南是长山县三区北旺庄人。一九二四年，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这时正是第一次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他拥护孙中山先生，支持国共合作，怀着迎接北伐战争胜利的喜悦

心情，参加了国民党。一九三〇年，马耀南在大学毕业前夕，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目睹了国民党的黑暗腐败，面对蒋介石的无耻行径，忿然退席，以示抗议。国民党以“亲共反蒋”的罪名开除了马耀南的党籍，并下令通缉。一九三三年，马耀南应长山乡亲们的邀请，回本县担任了长山中学校长。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党中央、毛主席正确分析了山东抗战将会出现的新形势，指示山东党组织迅速动员组织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统一战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山东省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迅速整顿加强了领导机构和各地党组织，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就在日军侵占华北、国难当头的时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被敌人吓破了胆，竟不顾民族危亡，率军不战而逃。清河平原各地方官员也纷纷逃散。散兵游勇、流氓土匪乘机四起，各树旗帜，自封“司令”。他们鱼肉乡里，各霸一方。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当时任长山中学校长的马耀南，他毅然抵制了国民党政府命长山中学南迁逃亡的指令，决心组织学生，投笔从戎，共赴国难。这时，中共山东省委正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拟定武装起义的计划，考虑到马耀南在当地群众中的威望和号召力，决定把长山中学作为一个起义点，派与马耀南早年相识的共产党员林一山同志前去联络。林一山同志到长山中学后，与马耀南同志谈得很投机，介绍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马耀南完全拥护党的决定，并要求林一山同志留下工作，因为林一山同志还另有任务（林一山被派往胶东工作，顺路联络马耀南），马耀南遂根据林一山同志提供的线索，亲到济南，找到

党组织，要求共产党派有经验的干部到长山中学开展工作。

山东省委很重视马耀南的这一行动，先后派刚刚出狱的共产党员姚仲明、富有作战经验的红军团长廖容标和原在鲁北工作的共产党员赵明新等同志到长山中学，准备武装起义。他们组织学生下乡宣传抗日；举办乡村小学教师训练班，指明抗战前途；设立游击战术训练班，培养军事干部。一次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正在积极酝酿。国民党顽固派也在注视着长山中学，注视着马耀南。他们屡次对马耀南进行威胁、恫吓，软硬兼施；姚仲明、廖容标、马耀南、赵明新等巧妙地与之周旋、斗争，赢得了时间，保证了起义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日本侵略军渡过黄河分两路南侵，一路进攻济南，一路迂回周村、张店，并于二十四日轰炸长山城。人心鼎沸，群情激愤，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起义。姚仲明、廖容标、马耀南、赵明新等先后带领革命师生奔赴预定起义地点——长山县九区黑铁山，毅然发动了武装起义。十二月二十七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宣告成立。这就是山东抗战史上有名的黑铁山起义。

起义后，马耀南同志利用他在当地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与廖容标、姚仲明、赵明新同志一起，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当地青年踊跃参加“五军”，黑铁山起义的烽火越烧越旺。在马耀南的影响下，其二弟马晓云、三弟马天民也参加了起义，并成为这支抗日队伍的骨干力量。

自此，五军积极活动于邹平、长山、桓台一带。李曼村、宋乐生、方子诚等同志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在章邱、邹平、长山三县交界的小长白山地区领导了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

抗日救国义勇军”，不久，编入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在黑铁山起义前后，党的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等同志，在昌（邑）潍（县）北部地区领导了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支队。”马保三、韩明柱等同志在寿光县牛头镇领导了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八支队”。李人凤、李曦晨、陈梅川等同志在临淄领导了武装起义，成立了“学生志愿军训团”。胡维鲁、李云鹤、刘斗辰同志在临朐北部领导了武装起义，成立了十支队，后来编入了临淄第三大队（即原来的“学生志愿军训团”）。起义后，各部队积极活动在小清河以南、胶济铁路以北的广大地区，主动出击，打击日军，进行游击战争。李人凤等同志指挥军训团，在辛店车站以西伏击了日本侵略军由张店派出的先遣侦察分队，毙伤敌分队长以下十余人。廖容标等同志指挥部队，在小清河陶唐口伏击了日军汽艇一艘，击毙了日军旅团长、联队长、高级参谋以下共十二人。在这种形势下，各阶层群众不分老幼纷纷参加抗日斗争活动。与此同时，早已逃之夭夭的国民党也设法往回派人，妄图排挤共产党的领导，控制收编这些武装力量，改变全民抗日的正确方向。另外，在清河地区还有些国民党顽固派和地主豪绅地方势力派，也纷纷以抗日之名，乘机拉部队，占地盘，扩大势力。他们横征暴敛，鱼肉乡里，大发国难财，把人民群众推到水深火热之中。

听了金明等同志的介绍，我们考虑到五军兵力较多，在这一带影响大，一些连队的政治基础比较好，遂决定首先就近整编五军，树起“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的旗帜；然后东进临淄，整编李人凤等同志领导的部队。以此为基础，

再整编其它倾向我军的部队。我们计划用整编促进根据地建设，打通西边长山、邹平与东边临淄的联系，使游击区逐渐发展成根据地。而且，由于黑铁山起义后不久，廖容标等同志就被调往鲁中四支队工作，五军急需加强党的领导。所以，形势逼人，任务艰巨，我恨不得立即见到马耀南，同他并肩战斗。

整编第三支队

一九三八年六月的一天上午，马耀南同志带领五军司令部的同志来到了长山城北苑城镇，在一所小学校里，我们见了面。他高高的个子，穿一身灰布军装，戴一副近视眼镜，面容和蔼，举止文雅，既有学者风度，又有军人气魄，共同的革命理想使我们一见如故。马耀南同志非常谦虚，说了一些仰慕久盼的话，我也实实在在地告诉他我是工农出身，文化低，今后的工作希望得到他多多帮助，我一定努力当好助手和参谋。我们谈得很投机。谈到当时的抗战形势，谈到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又谈到将来的抗战前景……忽然，马耀南象是想起来一件事，说：“差点把大事给忘了”。说着，便从挎包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递给我：“国夫同志，请你看一样玩艺儿”。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给他的信，信中以“鲁北行署游击纵队司令”的头衔利诱马耀南，妄图使他就范。国民党顽固派的这种无耻行径，并不是什么新鲜花样，他们对马耀南以及其他一些兵权在握的人，总是以封官许愿作为第一步，进而达到控制、掌握的目的，这是我们党早已估计到的。当然，马耀南不会受国民党顽固派的利诱，也是我们党早已估计到的。我把信任的目光投向马耀南——他也正以信任的目光看着我。随即他从我手中拿过那件“玩艺儿”，轻蔑地撕碎了，踏在脚底下：“沈鸿烈正等我上